

《苗族史诗》中文化负载词英译的生态翻译学透视

王葵

贵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中国·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民族典籍英译是新时期中国民族文化交流、传播, 提升中华民族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但民族典籍中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负载词英译难的问题却始终未能很好解决。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 对马克·本德尔所译《苗族史诗》中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语言文化负载词等五类文化负载词英译进行深度剖析, 发现恰当使用生态翻译学中的适应/选择和“三维”转换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能够较好地传达文化负载词在英译过程中的真实意义和内涵, 可为民族典籍的对外传播, 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 《苗族史诗》; 生态翻译学; 民族典籍; 文化负载词

Ecological Translation Perspective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Load Words in the *Miao Epic*

Kui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Guiyang, Guizhou, 550025,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of ethnic classics into English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exchange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ethnic culture in the new era, and to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However,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ultural loaded words with rich connotations in ethnic classics has not been well solved. Using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translation, this study conducts a deep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ive types of cultural load words in Mark Bender's translation of the *Miao Epic*, including ecological cultural load words, material cultural load words, social cultural load words, and language cultural load words. It is found that the appropriate use of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adaptation/selection and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 in ecological translation can effectively convey the true meaning and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load word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provide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external dissemination of ethnic classics and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well.

Keywords: *Miao Epic*; ecolog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ethnic classics; culturally-loaded words

0 前言

民族典籍英译实践, 兼具文学艺术再现与文化精神传递功能,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背景下, 更成为文化宣传和文学外交的重要手段, 对维护民族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稳定繁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 民族典籍中文化负载词始终因其复杂多样且极具民族文化特征的特定意义使得英译者很难达到理想“信度”和“效度”, 甚至可能出现词不达意的窘境, 让民族典籍在对外传播中始终成为一个“堵点”, 不利于他文化读者理解中国灿烂悠久的民族文化。随着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重要性日益凸显, 国家在推动民族典籍翻译方面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支持, 这使得众多民族典籍的翻译项目得以启动并取得长足发展。其中, 2006年由美国汉学家马克·本德尔在美国出版的《苗族史诗》的英译本《*Butterfly Mother: Miao (Hmong) Creation Epics from Guizhou, China*》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翻译项目。该译本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处理上成功地将苗族文化生态

融入了西方文学的生态环境中, 与当下翻译生态翻译学倡导的“适应/选择”机制高度契合, 实为民族典籍英译的一个典范。借助生态翻译学相关理论和方法对《苗族史诗》文化负载词技巧进行挖掘和提炼, 可以进一步丰富生态翻译学的应用研究, 同时为民族典籍中文化负载词英译实践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1 生态翻译学在民族典籍英译中的价值意蕴

生态翻译学起源于翻译适应选择论, 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 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1]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 具体涵盖生态范式、关联序链、生态理性、译有所为、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事后追惩等九个研究焦点和理论视角^[2]。该理论运用生态理性, 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实践进行整体性研究和指导,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自新世纪以来 20 多年间, 全国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指导的各类论文达 3000 多篇, 其中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达 1200 篇以上。同时, 生态翻译学得到了国际翻译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生态翻译学认为, 翻译过程是一个

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需要不断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同时做出适当的选择。因此,生态翻译学将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作为翻译原则。这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综合考虑语言、文化、交际等多个维度,然后进行适应和选择,即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关注语言层面的转换,还要关注交际和文化层面的转换,以实现翻译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马克·本德尔是一位在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拥有文学博士学位,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尤其关注中国西南民族民间口头传统的研究,翻译了多部中国口传史诗,包括《苗族史诗》、彝族叙事长诗《赛玻嫫》等,这些译作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民族文化提供了重要窗口。《苗族史诗》又称“苗族古歌”,是苗族重要的口头艺术形式,流传于贵州多个苗语方言区。马克·本德尔的英译本以苗族古歌传统对答式结构为基础,采用长短句形式翻译,每组史诗前有题解为读者提供导读。在对马克·本德尔英译本《苗族史诗》中的文化负载词这一翻译难点进行细部解读发现,正是其长期深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生活体验使得其翻译作品中处处透露出“不断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同时做出适当的选择”的生态翻译学高超技巧,是生态翻译学在民族典籍英译中运用的典范,体现了生态翻译学的独特价值意蕴。

首先,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是一个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在民族典籍翻译中,这一理论指导译者需要深入理解和适应原文的生态环境,包括文化背景、历史背景、语言特点等,并在此基础上做出适应性的翻译选择。其次,生态翻译学提出了多维度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作为翻译原则。在民族典籍翻译中,这一原则要求译者从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等多个维度出发,综合考虑翻译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第三,生态翻译学提出了“三维”(语言维、交际维、文化维)转换的翻译方法。在民族典籍翻译中,这一方法指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注意语言层面的转换,确保译文的流畅性和准确性;同时关注交际和文化层面的转换,确保译文能够传达原文的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第四,生态翻译学的评价标准包括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以及译者素质。在民族典籍翻译中,这一标准指导译者不仅关注翻译过程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还要关注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和译者的翻译能力,从而全面评价翻译质量。第五,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在民族典籍翻译中,这一理论要求译者充分考虑原文的生态环境,包括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的因素,确保译文能够在目标语言文化环境中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接受。此外,生态翻译学特别注重文化传递的核心地位。对于民族典籍而言,文化传递尤为重要。生态翻译学指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展现典籍中的语言情境和文化氛围,实现文化价值的传递,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支持。

2 《苗族史诗》英译本的生态根基

在探讨生态翻译学与《苗族史诗》英译本之间的关系时,不难发现其中交织着“适应”与“选择”的复杂联动过程,这一过程尤其体现在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的转换上。对于这类富含民族特色的典籍翻译,其背后承载着深厚的文化信息,因此,翻译工作并非仅仅局限于史诗情节的直译,而是需要译者深入挖掘并理解作者与作品的行为风格,同时在尊重并重塑原作文化预设的基础上,灵活地传递出文字背后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

2.1 马克·本德尔与《苗族史诗》

马克·本德尔系美国汉学家,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到中国工作并从事学术考察的美国学者之一,主要从事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尤其关注中国西南民族民间口头传统研究,多次赴广西、贵州、云南等中国典型民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查和学术考察,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学术论文,将多部中国口传史诗翻译成英文。《苗族史诗》是中国苗族人民世代传承的口头文学瑰宝,记录了苗族的起源、历史、神话、传说、社会结构、生活习俗等丰富的文化内容。这些史诗不仅反映了苗族人民对自然和宇宙的认知,还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多年来,多位传教士和汉学家致力于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介绍给世界。马克·本德尔所译《苗族史诗》收录了描绘苗族祖先创世、造日月、育万物的神话,以及面临洪水灾难和族群迁徙的一系列壮丽叙事史诗,向世界展示了苗族丰富的历史文化、深邃的哲学思想和独特的民俗风情。在翻译过程中,马克·本德尔不仅精准地传达了史诗的内容,更致力于保留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语言风格,这对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西南民族地区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与习俗具有深远意义。

2.2 译者的适应与选择

在生态翻译的理念下,译者被赋予了“适应/选择”的核心角色,并以此为基础,力求在翻译过程中实现“译有所为”的目标。这一追求主要体现在译者对内部因素的选择性适应以及对外部需求的适应性满足两个方面。简言之,译者是为了保证译作的质量而进行选择,进而实现其翻译的价值和目的。首先,是内部因素的选择性适应。即强调译者把原文作为核心要素构成的翻译生态环境和译者之间的双向适应过程。因汉英两种语言在社会语境上存在显著的生态差异,马克·本德尔在翻译过程中灵活采用了多样化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如增补细节、适当省略、直接翻译与意译相结合、隐去部分词汇以及从宏观角度审视文本等。这些策略旨在强化句子、段落和文章之间的逻辑联系,确保在翻译过程中努力实现文本在目标语言生态环境中的和谐统一,并力求让目标语言读者的阅读体验与原文读者的体验保持一致。马克·本德尔在选择译文类型和风格时展现出了高度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这部英译本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得到了升华。他的翻译行为不仅体现了对原作审美情趣的保留,也有

效地促进了苗族文化的创造性传播,彰显了翻译作为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价值。其次,是外部需求适应。包惠南指出,中国当前在将本国杰出作品介绍给世界的过程中,步伐稍显缓慢,与引进外国文化作品的频率相比,我们的文化输出显得不够平衡。在不断引入外国文化和文学作品的同时,中国自有的民族特色的优秀文化成果却未能在国际上获得足够的认可和传播^[3]。

3 《苗族史诗》英译本文化负载词生态翻译学剖析

文化负载词,又称文化独特词或文化内涵词,是指那些打上了某一语言社会的地域和时代烙印,表示某一种文化所特有事物和概念的词汇。这类词汇不仅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往往只存在于某一种文化中,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是空白的。由于这种“我有你无”的特性,文化负载词在跨文化交流和翻译中常常成为障碍。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有关文化负载词的分类是1988年由纽马克(Newmark)提出的五分法,即将文化负载词分为生态文化负载词、物质文化负载词、社会文化负载词、语言文化负载词和宗教文化负载词^[4]。《苗族史诗》从其标题的英译(《Butterfly Mother: Miao (Hmong) Creation Epics from Guizhou, China》)手法即可见生态翻译的显著特征,而其中五类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更是充分展示了译者高超的生态翻译技巧,可为民族典籍英译提供范例。

3.1 生态文化负载词

生态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与自然环境、地域特征、动物植物、气候状况等相关的词汇。对于该地区的人来说,它们是文化的一部分,而对于不熟悉这些特点的人来说,理解这些词汇可能会有难度。例如,中国成语“不到长城非好汉”“洛阳纸贵”“不到黄河不死心”等,它们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地域特点。

《苗族史诗》的叙事脉络深刻展现了人与自然、动物、植物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苗族先民深信人与自然万物共享同一根源,彼此紧密相连,万物皆有灵。这种信仰让苗族人民以一种神秘而独特的视角来欣赏和理解自然,认为自然界中的每一个存在都可以比照人类的存在。正如马克·本德尔所言,口头史诗中的文化背景包括了诗中提及的所有元素,因此在进行翻译工作时,译者需要深入考虑文本中的文化和生态信息。对于特有的苗族植物、药物等,《苗族史诗》英译本从生态翻译角度考虑了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语言特点,做出了适应性选择。例如原文经常出现“葛藤”“蛊药”和“菘蓝”生态文化负载词,译者将“葛藤”翻译为“Ge vine”,试图在目标语言中保留源语言的发音特点,并且“vine”这个单词在一定程度上与“葛藤”的含义相似,目标语言的读者对“vine”这个单词非常熟悉,并且他们知道“vine”可以用来泛指各种攀缘植物;

“蛊药”在苗族文化中是指一种通过特殊仪式或手段制作的具有邪恶力量的药物或毒物。出于同样的考量,译者选择“Gu poison”来翻译“蛊药”是较为贴近真实的,因为“Gu”在英文中可以被理解为“蛊”的音译,而“poison”则准确地传达了“蛊药”的毒性或邪恶特性;“菘蓝”(purple plant)的翻译则以意译的方式体现了适应选择原则。译者在这个翻译的处理中没有沿用拼音加描述的方法,而是先对“菘蓝”进行了生态适应,再选择解释的方式告知目的语读者这个植物的颜色特征,以此传递给读者这是可以作为染色的一种植物的信息。这样不仅准确地再现了苗族特有事物的形象,而且实现汉语文化负载词在目标语言中的有效传达,让目的语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和感知这些词汇所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从而提供一个更加全面和丰富的阅读语境。再如:

“是谁帮他咬?

打渔郎鸟帮他咬。”

本德尔将其译为:

“Who helped crab to bite them?

It was Cormorant who helped him to bite them.” (P41)

在“运金运银”这一节里说到螃蟹如何运金银时提到了“打渔郎鸟”,这是《苗族史诗》里面一种专门打鱼的鸟,类似于小鱼狗或翠鸟。在英国国家虽没有这样名称的动物,但有与其相似的动物“Cormorant(鸬鹚)”。因此,译者在适应了“打渔郎鸟”在源语文化所指对的动物后,考虑到动物在中西方文化中负载的差异意象,若采用直译会让译语读者深感不适,于是把“打渔郎鸟”译为“Cormorant(鸬鹚)”。 “鸬鹚”在西方文化中也是以鱼为食的动物,且其长脖子的形象也同于此处的“打渔郎鸟”的意象,且鸬鹚也是西方文化中为大众所喜爱的物种,并用注释的方式对此进行阐释“A kind of bird called ‘the fisherman’, a small kingfisher”。此处,译者在深谙源文化的基础上,采用了选取目的语中相似事物来适应目标语言读者的文化偏好和审美习惯,并通过选择添加注释加以解释,确保生态文化负载词在目标语言环境中能够有效传达其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而达到有效的交际目的。

通过上述案例,可将生态文化负载词英译的基本类型概括为:①适应原文中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即音译+阐释事物本质)做出相应译语选择;②在适应原文文化负载词文化背景的基础上,选取目的语中对应的相似事物,并辅以注释说明。

3.2 物质文化负载词

物质文化负载词是指与特定文化中的物质对象、技术、建筑、艺术作品或其他物理现象紧密相关的词汇。其不仅指代具体的物体或现象,而且蕴含着与这些物体或现象相关的文化意义、使用方式、社会价值和历史背景。为了避免因这类词汇缺失带来的陌生感,译者往往可以运用直接翻译加注、省略等方式进行处理,巧妙地将中国元素融入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视野。例如原文:

“拿什么来接?
拿什么来焊?
拿方阳药来接,
拿都勒水来焊。”
本德尔将其译为:

“What would be used to repair them?
What could be used to refurbish them?
Magic Ja Fang Yang medicine was brought to mend them,
The juice of the Fruit of Immortality was used to weld them.” (P17)

据载,“金银歌”这个部分里说的“方阳药”是苗族自有的一种传奇药物,“都勒”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奇果实,吃了这种果实,人和动物都可以恢复年轻。当一只公鸡吃了丢弃的“都勒”种子后,它的脸变得鲜红,羽毛变得美丽。这种果实的汁液被称为“不朽之果”,这两种物质都是苗族特有的文化现象。通过译文可见,在翻译者所创造的生态翻译环境中始终以服务目的语读者为目标,在原文基础上体现了译者中心的处理方式,通过在自然行文中对物质文化负载词“方阳药”的翻译增加(“神奇的”magic)这个功能解释;对“都勒水”名称的省略,将“不朽之果”翻译为“The juice of the Fruit of Immortality”,以适应和平衡译语的生态,做到自然且不留痕迹地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并体验苗族的独特文化,达到了将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融入译语的生态系统中的交际目的。

物质文化负载词往往是目的语文化里的“空白”文化现象,对于译者的挑战在于如何根据源语和目的语做双向生态语境的适应和选择。本德尔此处译文处理给予两方面的启示:一是通过对特有的苗族物质进行阐释适应源语生态环境,二是根据目的语生态环境选择“增译”和“减译”的翻译策略以确保译文的效度。

3.3 社会文化负载词

社会文化负载词是指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并使用的词汇,它们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和历史意义,与一个社群的价值观、生活习俗、历史事件或社会结构紧密相关,对于社群成员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和情感联系价值。《苗族史诗》的译者很好地在这类负载词中采用了生态翻译学中的文化适应性转换理论,不仅考虑到不同层面的语言形式在“语言维”上的适应性转换,确保了语言的流畅和自然,还考虑原文和译文在文化特性和内容上的差异。这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使原语言适应目标语言的社会文化环境,同时在“文化维”上做出适应性选择,确保双语文化内容的准确传达和解释。译者在处理社会文化负载词时,需要在语言和文化层面进行细致的考量和恰当的调整,确保翻译不仅在语言上通顺,而且在文化上也能够准确传达原意,从而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实现“交际维”的转换。例如原文:

“人们拿来染衣裳
老人穿起御风寒
青年得穿去游方
到平坝上踩鼓玩”
本德尔将其译为:
“People take it to dye clothing
Old people wear the clothing to keep off the cold winds;
Young people wear it to Yefang,
wear it to a flat place to dance the drum dance.” (P5)

此处的“游方”和“踩鼓”都是典型的苗族文化习俗。前者是特有的一种包含唱歌、跳舞、调情等的求爱活动;后者是一种在节日场合流行的舞蹈,人们随着鼓点围成大圈跳舞。译文中“游方”采取音译加注译方式,在文内顺译为“Yefang”,确保了语言的流畅和自然,并保持了原有的文化特色,可以视为是对“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通过加注解释做到“文化维”和“交际维”转换;“踩鼓”意译为“dance the drum dance”,是通过对源语文化蕴藏的文化内涵的阐释和准确传递进行了“文化维”的转换,既确保了语言通顺,又在文化层面填补源语所指的空缺与偏差,有效减少了文化隔阂,实现“交际维”。

再如:
“金银从哪条路走?
谁都不知道,
赶快找师傅来卜。”
译文为:

“What road did Gold and Silver take?
No one knew.
Go quickly to find a sorcerer to divine it.” (P35)

这一段中“赶快找师傅来卜”的“卜”即“占卜”,是典型的苗族文化特点。苗族占卜文化源于苗族先民“万物有灵”的信仰,他们相信周围的各种看不见的鬼神时刻都与人发生某种联系,给人带来吉凶祸福。因此,苗族人民通过占卜来预测未来、判断吉凶,并据此确定某些活动的可行性。这种占卜文化不仅影响了苗族人民的的生活方式,还成为他们文化传承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此处,“师傅”被意译为“sorcerer”,尽管“sorcerer”在英语中通常带有负面含义,指使用巫术或魔法的人。但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为了传达原文的“师傅”所代表的特殊能力或角色,使用“sorcerer”是为了寻找一个相对接近的词汇。“卜”在中文中通常指占卜或预测未来,这里用“divine”来翻译是合适的,因为“divine”在英语中也有预测或占卜的含义。考虑到“师傅”和“卜”在中文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各要素保持了和谐统一,既做到在译文在形式上(语言维)的准确对应,更在神韵上(文化维)与原文保持了一致。同时,译者充分理解并尊重东西方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以此为基础,通过精准的翻译手法和策略,达到文本在两种语

言文化中的生态平衡,实现双语交际意图的准确传递(交际维)。由此可见,社会文化负载词更加强调生态翻译学中“三维”的转换,更追求以译者为中心的再创造。

3.4 语言文化负载词

语言文化负载词主要涵盖极具汉语特色的四字成语、习语、谚语等。从生态翻译学角度来看,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需要充分考虑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并通过适应/转换原则来达到文本的语言生态平衡。

首先,从《苗族史诗》中四字成语的英译,可以明显看出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生态翻译特征。原文:

“来看制天造地吧
谁来制天炼地呢
远古造天的公共
太初制地的婆婆
他俩造个大坩锅
用它来制天
用它来炼地”

译文为:

“Let's see who came to create the Sky and Earth
see who came to smelt them.

In those ancient times, it was the Sky-creating Grandfather;
In those remote times, it was the Sky-making Grandmother.
They made a great crucible,
Then used it to smelt the Sky and Earth.” (P11)

这是来自第一章《金银歌》第二节的“制天造地”。原文中的“制天炼地”包含了创造和精炼两种动作,“smelt”一词通常与金属冶炼相关联,译者从语言维和交际维的转换出发,以“smelt”一词解读和传达出制天炼地的意象,同时还很好地呼应了后文提到的大坩锅(crucible)。追求的是在保持译者与翻译环境协调一致的同时,努力实现译文在精神和形式上的完美融合,并充分考虑到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做到了对目的语精准的词汇选择,实现了文本在语言生态上的均衡。

再看第二类习语和谚语负载词的生态化翻译:

原文:“好年成天狗吃谷子,

坏年成天狗吃太阳。”

译文:“In years of good harvests, the Dog eats grain;
But in years of bad harvests, it eats the Sun.” (P69)

文中“天狗吃谷子”和“天狗吃太阳”是两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意象。译者将习语拆解以向源语文化靠拢,选择了直译的方式,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意象和含义。此外,“好年成”在汉语文化中指的是好的年景,象征丰收和满足;“坏年成”则是坏的年景,是一种夸张的表达,暗示天气异常或灾难。译者在翻译时添加了一些解释性的语言“*In years of good harvests*”,用生态翻译的角度实现了适应性转换,以帮助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和深层含义,并且很好地在保留原文文化特色和适应目标语言文化之间找到了平衡。

总之,语言文化负载词的生态翻译处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语言维”转换的直接效用需建立在译者对双向生态环境的适应基础上。结合译者的深厚双语及文化功底,精准做好语言维转换才能够更好地做到汉语成语、谚语以及四字词的文化内涵传递和交际目的。

民族文化的外宣,需要强化民族典籍的高质量外译。无论是英语,抑或其他外语语种,在对民族典籍的翻译中,均可通过借鉴或参考《苗族史诗》英译中充分呈现的生态翻译学理念与方法,提升译本真实呈现民族文化与传统的效率,最大程度实现译本的真实还原性。特别是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中,更需要借鉴和参照生态翻译学倡导的机制,用目标语言进行思考,尽力弥合文化差异,构建起连接东方故事和西方读者情感的桥梁。

参考文献:

- [1]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2]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32(2):5-9.
- [3] 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王葵(1978-),女,中国贵州安顺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英语口语译、笔译等领域研究。